

# 新文学批评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

刘卫国\*\*

## 〔摘要〕

文化保守主义是新文学最为顽固和难缠的对手，它曾在五四时期、1990年代、2004年至今，三次掀起对新文学的批评浪潮。这三次浪潮，批评的焦点分别集中在白话文、激进主义及对中国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之上。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学的批评，虽然动摇不了新文学的存在合法性，但能增进人们对新文学缺陷的认识，也有利于新文学的健康发展和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

关键词：文化保守主义、新文学批评、现代文学研究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新文学研究学术谱系论”（编号10BZW077）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0WKPY49）阶段性成果。

\*\*广州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文化保守主义是在中国大地流淌已过百年的一股思潮。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中国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思想界出现了两种思路，一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思路，认为应彻底破旧立新，全盘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拥抱西方新学；一是文化保守主义的思路，认为应返本开新，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走渐进改良之路。<sup>1</sup>

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文学的关系可谓意味深长。新文学毫无疑问是文化激进主义的产物，而文化保守主义作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对头，一开始对新文学就不待见，百年来，文化保守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对新文学发起攻击，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对于新文学来说，文化保守主义可以说是最为顽固和难缠的对手。

以往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曾有关注，但大都集中于对代表人物或单次事件的评析，不少研究有深刻的“洞见”，但还欠缺一种贯穿全局的“远见”。本文试图对 20 世纪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中国新文学的批评作一次“长时段”的回顾和评析。本文认为，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放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更容易看出各个阶段和各代表人物在批评新文学时的洞见和不见，也更容易梳理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和内在联系，而通过评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新文学的批评，我们可以对新文学的成就及缺陷形成更为深入的认识，并洞悉新文学研究的新动向。

## 一、第一次浪潮：攻击白话文

回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新文学的批评，要从林纾讲起。林纾是最早站出来挑战新文学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917 年 1 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白话文学，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一个月后，林纾即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与胡适唱反调。可惜林纾讲不出古文之不当废的理由，他底气不足地感叹道：“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刘亦自有其不可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sup>2</sup>不能道其所以然，暴露了林纾理

<sup>1</sup> 学术界一般将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顽固主义区分开来，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变革中国文化，而文化顽固主义不主张变革中国文化。参见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6 页。

<sup>2</sup> 林纾：《论古文之不当废》，1917 年 2 月 8 日《民国日报》。

论修养的不足。无奈何，林纾作小说《荆生》、《妖梦》，对新文学倡导者进人身攻击，期待荆生等伟丈夫将他们打翻在地。

眼看白话文运动飞速发展，林纾知道荆生等伟丈夫难以阻挡，他先把希望寄托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公言报》发表《致蔡鹤卿书》，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又“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并要求蔡元培制止这两个倾向，但只遭到蔡元培不冷不热的回应。林纾只好再次上阵，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sup>3</sup> 坚持维护古文的地位，认为“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但这篇文章还是没有讲出什么道理，林纾最后哀叹：“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请诸君拭目俟之。”

林纾对新文学的攻击，涉及到道德和语言两个问题，但其焦点在语言问题。林纾认为不应完全抛弃古文。这一观点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对古文白话消长大势确实认识不清。白话不断压缩古文的地盘，取代古文成为文学的主导语言，在中国文学史上本就是大势所趋。林纾这样描述推广白话文的恐怖后果：“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啾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但这个后果其实并不可怕，相反非常可喜，现代社会的大势就是普及教育，就是要让出身“稗贩”的人也能当上“教授”。这段话只是道出了林纾不甘心丧失文化权力和文化资本的心声。

新文学运动刚刚发生时，文化保守主义在社会上还是颇有势力的。但是不少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学漠不关心，对新文学的发展势头也掉以轻心，比如严复1919年夏天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这样评论林纾与新文学阵营的争论：“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sup>4</sup> 但是，白话文并没有像严复所期待的那样“自败”。“天演”的结果，是白话文取得了胜利。白话文很快就得到了民国政府教育部的承认，迅速推广开来。

但新文学很快又遇到了新的对手，这就是学衡派。学衡派多数成员曾留学欧美，自恃比新文学运动倡导者更精通中外学理。他们强烈反对新文化和新文学。

<sup>3</sup> 《文艺丛报》1919年4月第1期。

<sup>4</sup> 严复：《与熊纯如书》，收入《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699页。

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甫一启齿，而弊端丛生，恶果立现”，批评新文化倡导者“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非教育家乃政客也”，又反对独尊白话，主张文言与白话并存：“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岂可尽弃他种体裁，而独尊白话乎。”梅光迪还批评新文学的理论基础进化论，认为“文学进化至难言者”，“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sup>5</sup>胡先骕反对新文学的白话文路线，认为“白话不能全代文言”，“即或能代之，然古语有云，利不十，不变法”，<sup>6</sup>还逐条驳斥胡适的“八不主义”，全盘否定胡适的《尝试集》，试图证明文学革命“此路不通”，新文学创作没有前途。<sup>7</sup>

学衡派对新文学的批评，确实指出了新文学在理论和创作上的一些缺陷，在理论上比林纾更高一筹，但其用心仍在阻击白话文，试图从根本上否定新文学的白话文学路线。学衡派和林纾一样，未能洞悉时代潮流。现代社会就是要独尊白话，将文言从原来的中心位置上赶下来。白话文言可以并存，但中心位置必须换位，语言“变法”势在必行。学衡派反对语言“变法”，这就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在学衡派之后，又有章士钊出来批评新文学。章士钊本是新派人物，曾引领晚清文学变革之潮流，但他在1925年担任民国教育部部长之后，立场转趋保守，他在《甲寅》周刊上连续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赞美文言文，攻击白话文，声称“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sup>8</sup>批评白话文“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sup>9</sup>章士钊以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身份，压迫白话文教育，给新文学曾造成一定的压力。当时有人说章士钊比林纾更为危险可怕：“列位，不要把那老虎运动当作一件小事，这实在比‘五四’时的荆生运动更危险可怕。因为那时的清室孝廉林纾并没有实权在手。”<sup>10</sup>

<sup>5</sup>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sup>6</sup> 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东方杂志》16卷3期，1919年3月。

<sup>7</sup> 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第1、2期连载，1922年1、2月。

<sup>8</sup> 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甲寅》1卷14号，1925年10月。

<sup>9</sup>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1卷9号，1925年9月。

<sup>10</sup> 辛民：《言论界之分野》，《京报副刊》1925年8月21日。

章士钊的文章曾被人赞誉为“逻辑文学”，<sup>11</sup>但他对新文学的批评，在逻辑上存在问题。白话文真的就“流于艰窘，不成文理，味同嚼蜡，去人意万里”吗？“吾之国性群德”真的就“悉存文言”吗？章士钊建立起来的这两个大前提均不成立，因此后面的一系列推论也就无效。

从林纾到章士钊，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文学发起了一次次攻击，新文学阵营则奋起反击，双方的较量很快就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文化保守主义未能抵抗住新文学阵营的反击。林纾 1924 年去世，章士钊 1926 年离职，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丧失了重要力量，而学衡派后来也转变了激烈反对白话文的立场。如梅光迪，“他与自己的女儿通信时，总是用生动的白话文来表达自己的父女之情”。<sup>12</sup>又如吴宓，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接受了增入新文学、白话文及新式标点的主张，这件事可以说象征着学衡派向新文学阵营认输。<sup>13</sup>

不过，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并未完全中断，在 1930 年代仍余波犹存。1933 年，钱基博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该书以文言写作，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对新文学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由于白话文的使用已成定局，钱基博只能挑剔白话文的创作成绩，他认为，诗从《尝试集》起，无论自由体，无韵诗、小诗、格律体，都“陆离光怪”，无足取者。散文则竞相欧化，“佶屈聱牙，过于《周诰》”。这些批评显然并不客观。钱基博还从 1930 年代的幽默小品文热潮返观新文学历史，认为“十数年来，始之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矣”，钱基博由此感叹：“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十年非久，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讽刺的是，钱基博翘首盼望的小品文复古热潮，很快也被“时代洪流”疾卷以去，这就使得钱基博对新文学的批评也成了“戏狎”之词。

概而言之，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次浪潮，对新文学的批评聚焦于白话文。应该承认，新文学的白话文理论确有漏洞，但是，使用白话文乃是文学发展及社会发展大势所趋。文化保守主义者未能认清这一大势，他们本来还准备看白话文创作的笑话，但白话诗歌、散文、小说、话剧创作中均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就使得他们对白话文的批评沦为笑柄。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sup>11</sup> 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新潮》2卷5号，1920年9月。

<sup>12</sup> 杨竹亭：《梅光迪——文采飞扬启后学》，收入胡建雄主编《浙大逸事》，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8 年版，46 页。

<sup>13</sup> 《吴宓日记》第 IV 册，北京：三联书店 1998 年版，197 页。

仍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林纾将中国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崇仁、仗义、守信、尚智、守礼”，认为外国人也“未尝悖也”，<sup>14</sup>确实发掘出了中国儒家文化亘古不变的价值。学衡派的胡先骕批评新文学阵营“立言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认为“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sup>15</sup>也指出了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弊病。章士钊反对“谋毁弃固有之文明务尽，以求合于口耳四寸所得自西方者，使之毕肖”，认为这种文化转型思路“至为肤浅”，<sup>16</sup>其观点也有道理。即便钱基博所说“人情喜新，亦复好古”，也并非毫无道理。因此，这一波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虽然退潮，但文化保守主义并未丧失存在的合理性，必能卷土重来。

## 二、第二次浪潮：批判文化激进主义

在八年抗战及随后的国共内战中，由于战争成为时代的主题，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退居边缘。到了1949年，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中国大陆彻底失去了存在条件，转而到港台地区谋求发展。1950年代，唐君毅、张君勱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联合宣言，标志着海外新儒家崛起。海外新儒家是文化保守主义在新的时空中的新发展。而在大陆，新文学在1950年代已被建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先被确定为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但新民主主义思想很快被毛泽东自己抛弃，毛泽东相继提出“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毛泽东自身思想的不断激进化，不仅造成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停的折腾，还造成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性后果。

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也从海外传入。1986年底，贵州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林毓生的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林毓生认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的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sup>17</sup>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完全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此后各种文化反传统主义的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

<sup>14</sup> 林纾：《致蔡鹤卿书》，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

<sup>15</sup> 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sup>16</sup>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1卷9号，1925年9月。

<sup>17</sup>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页；2-3页。

主义为出发点的。林毓生还将“五四”与“文革”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文化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进一步彻底摒弃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sup>18</sup>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陆学术界反思历史，多赞同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说，<sup>19</sup>即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不彻底，致使封建思想后来乘机复活，导致文化大革命这一大灾难的发生。大陆学界主张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启蒙理念贯彻到底，在中国实行被中断的启蒙。而海外新儒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潮流，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激进主义的恶果。双方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

作为新启蒙运动的一支生力军，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海外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观点很不以为然。王瑶、严家炎等人也纷纷回击海外新儒家的观点。王瑶指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的重新估定价值绝不是简单粗暴的全盘否定传统，而恰恰是用现代的科学观点与方法对传统文学进行再认识、再估价与再发现，使其在新的文学变革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从而有助于推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sup>20</sup>严家炎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坚决反封建，却并没有全面反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但没有全面反传统，反而用现代意识重新整理传统文化，充分肯定了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sup>21</sup>

王瑶、严家炎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主义运动，以为这样可以对林毓生等人的观点釜底抽薪。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事实上确实不能说是一个全盘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但从思维方式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又确实存在着激进主义倾向，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而王瑶、严家炎在反驳林毓生等人的观点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了他们的观点，即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价值的，而激进主义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是错误的选择。

<sup>18</sup>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页；2-3页。

<sup>19</sup>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走向未来》创刊号，又收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sup>20</sup> 王瑶：《“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sup>21</sup> 严家炎：《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感》，收入《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几经碰撞之后，文化保守主义在 1990 年代终于在国内学术界找到了响应者。其中，新启蒙领军人物王元化的思想变化最具有典型意义。1980 年代，王元化曾经批评林毓生的观点，认为林毓生“身居海外，昧于实情，被彻底批判和彻底决裂的叫喊所迷，以致作出错误判断”。<sup>22</sup> 但是到了 1990 年代，王元化也开始反思激进主义，王元化自问自答说：“五四与文革是否可以进行比较呢？我以为两者的运动性质截然不同而不容混淆，但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思维方式来看，却是可以比较的，甚至是有相同之处的。激进主义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改革运动屡遭失败，这是激进主义在遍地疮痍的中国大地上得以扎根滋长的历史原因。环境过于黑暗，爱国者认为，只有采取过激手段才能生效。因此，越激烈越好，矫枉必须过正，结果往往是以偏纠偏，为了克服这种错误而走到另一种错误上去了。”<sup>23</sup> 王元化尖锐地指出：“我认为激进主义纵使不是极左思潮的根源，也和它有着密切的关系。”<sup>24</sup> 这是因为，激进主义者“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之余地，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给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改造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sup>25</sup> 王元化从反对林毓生的观点到认同林毓生的观点，说明了文化保守主义在国内已经找到了同盟军。

在里应外合之下，文化保守主义终于形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在其冲击之下，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

### 一是重新评价学衡派

在 1990 年代之前，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及林纾、学衡派和章士钊，一直都是持

---

<sup>22</sup> 王元化《为五四精神一辩》，收入《五四：多元的反思》，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1989 年版，8 页。

<sup>23</sup> 王元化《90 年代反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145-146 页；6 页；144 页。

<sup>24</sup> 王元化《90 年代反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145-146 页；6 页；144 页。

<sup>25</sup> 王元化《90 年代反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145-146 页；6 页；144 页。



批判立场的，将其视为新文学的封建拦路虎。<sup>26</sup> 19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之后，现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重评这些封建拦路虎的热潮。其中，由于学衡派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特色，最先得到重评。

孙尚扬的《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sup>27</sup>认为，“五四”人以其偏激而又执著的启蒙情怀，以各种急于用世的手段去倡导建设、实施自己心目中的新文化，而对无用于世的学术不屑一顾，结果导致意识形态激情泛滥，并造成新的学术专制。而《学衡》诸公大都以坚守“智识贞操、学问良知”为己任，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检讨和批评，大都能遵循慎思明辨、平情立言的学术精神，并竭力维护启蒙新潮扫荡殆尽的“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虽然这种学术取向未能、也必然不能起到斡旋时势的作用，《学衡》诸公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批评五四启蒙运动非学术的手段和方法，严肃、虔诚地确立学术规范。魏建、贾振勇的《学衡派再评价》<sup>28</sup>认为：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转型期的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是互相支撑、互相制约的互补的两极。学衡派的所作所为，补充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缺漏，部分地抑制了文化激进主义的褊狭，至少是从反面刺激和促进了新文学主流的正常发展。徐传礼的《关于学衡派和新青年派论争的再认识》<sup>29</sup>也认为，学衡派的功绩，在于纠新青年派之偏，补新青年派之缺，成为新青年派的诤友和论敌，构成了当时学术界的生态平衡。这些研究，均正面阐述了学衡派的意义和价值。

## 二是重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取得了神圣的地位。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激起强烈反响。人们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中断扼腕叹息。但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五四新文化

---

<sup>26</sup> 1980年代学界通行的教材——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第一册称：五四新文学就在同林纾所代表的封建守旧派文人的战斗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以后又以打倒《学衡》、《甲寅》等标榜“国粹”、主张复古的封建“拦路虎”而向前发展。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1页。

<sup>27</sup> 《二十一世纪》1994年4月号。

<sup>28</sup> 《文学评论》1995年第4期。

<sup>29</sup>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1993年，郑敏发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新诗创作》，<sup>30</sup>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五四”白话文运动。郑敏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过于强调语言的断裂性，采用了过于激进的策略对文言传统进行了偏颇的否定，拒绝古典文学传统，使白话与古典文学相对抗，从语言到内容都否定继承，造成“白话自我饥饿、自我贫乏”。其后果是“为白话文的发展带来很大的障碍”，使“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论者追究到胡适、陈独秀领导白话文运动时的思维方式，并将“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在思维方式，特别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二者都是将传统与革新看成二元对抗的矛盾，因此认为只有打倒传统才能革新，而从今天解构思维来看，这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对待矛盾的封闭式的思维，从心态上讲，是简单化理想主义的急躁。”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强劲冲击，激起了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强烈反弹。1996年，王富仁发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sup>31</sup>王富仁认为，新儒家的文化思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已经开始侵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念体系。“五四”文化断裂论，白话文革命错误论，“五四”科学主义论，这些本质上属于新儒家学派的“五四”文化观当运用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否定的绝不是哪一派的文学，而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诞生的权利。当它连诞生的权利也没有了的时候，当它只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怪胎的时候，这个学科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王富仁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天然地植根于五四新文化的根基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以承认中国现代文学存在的合理性为基本前提的文学研究学科，而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就是五四新文化革命的合理性的证明，它的存在的文化基点也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基点，只有用五四新文化的基本价值标准来阐释它，了解它，才能说明它的意义和价值，离开了这一标准，不论在哪个局部问题上看来多么有道理，但在整体上起到的却必然是瓦解它，解构它的作用。瓦解了它，解构了它，我们这个学科也就只好作鸟兽散了。王富仁时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他的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号召现代文学研究界同人共同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在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行列中，谭桂林的态度最为激进。他认为：“当

<sup>30</sup> 《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sup>31</sup>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我们想到清末民初时代国民思想的雍塞就好像锁闭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正由昏睡走向死灭；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就好像一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的历史真实，我们就宁愿向那些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像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取火种一样从西方引进近代民主科学精神并且急于用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表示更大的敬意。”他还说：“如果按照学衡诸公的意见，仅仅止于着重研究，仅仅止于阐求真理，即使他们的新文化建设的构想真的能够避免和匡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出现的偏颇与弊端，恐怕现在的我们也还在封建礼教思想的铁屋子里沉沉酣睡，说些‘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残忍的昏话。所以在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实践与空谈之间，历史选择了前者，这是历史之幸，也是民族之幸。”<sup>32</sup>

如果说王瑶等人争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激进主义的问题，那么，谭桂林讨论的则是激进主义对不对的问题。王瑶等人极力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激进主义的运动，暗含的逻辑实际上是认为激进主义并不好，而谭桂林则毫不犹豫地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激进主义的运动，并且旗帜鲜明地认为激进主义是历史正确的选择。话说到这个份上，显示文化激进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立场已难以调和。

应该说，文化激进主义的出现，确实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文化保守主义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作为事后诸葛亮，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可以的，但要彻底否定文化激进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则是行不通的。这一点谭桂林说得对。不过，谭桂林承认文化激进主义的合理性，却完全忽视文化激进主义的危害性，其观点也并不全面。

在 1990 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浪潮给现代文学研究造成很大冲击，但学界主流还是赞同文化激进主义。在学界主流的批判下，这一波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后来慢慢退潮，但也播下了种子，找到了传人。在 1990 年代末期和 21 世纪初期，仍有一些学者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重评现代文学，特别是重评林纾、章士钊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并未完全中断。

<sup>32</sup> 谭桂林：《评近年来对学衡派的重估倾向》，《鲁迅研究月刊》1997 年第 2 期。

### 三、第三次浪潮：聚焦国民性和传统文化

2004年，被大陆学界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元年，在这一年，相继出现了“读经论争”、“龙场峰会”、“甲申宣言”，从这一年开始，经过数年蛰伏的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再度奔涌。

在这次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中，对现代文学研究产生影响的当属摩罗和秋风两人。

摩罗的贡献在于批倒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一个支配性理论——“国民劣根性”理论。

在大陆学术界，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反思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刚开始在器物上感觉与西方存在差距，因之而有洋务运动，接着是在制度上感到差距，因之而有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最后是在思想文化上感觉不足，因之而有新文化运动。<sup>33</sup> 新文化运动主要是解决中国人的思想变革问题，因为中国人在思想精神上存在着诸多病症和缺陷。这是一种国民劣根性，只有彻底批判国民劣根性，中国才有新生的希望。新文学则担负着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重任，现代文学研究界曾将“改造民族的灵魂”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sup>34</sup>

1990年代，刘禾曾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质疑国民性话语，她认为，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国民性的话语一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sup>35</sup> 不过刘禾的理路比较玄奥，不易为常人理解，而摩罗的质疑更为一针见血，浅显易懂。摩罗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确有很多非理性的现象，但是非理性现象决不是中国所独有，“屈辱之中谁都容易狭隘”、“仇恨之中谁都容易凶残”、“困窘之中谁都容易荒谬”，人在困境之中都难免做出荒谬举措，人在绝望之中都难免做出非理性行为，这是人性的一般反应模式，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sup>36</sup> 摩罗认为，五四文化人之

<sup>33</sup> 最先表述这一观点的是梁启超 1923 年 2 月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该文收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39-48 页。

<sup>34</sup>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 年第 5 期。

<sup>35</sup> 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收入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sup>36</sup> 摩罗：《中国站起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150-151 页；2 页；27-28 页；

所以弄出国民劣根性这一说法，是因为“一百年来，一些中国人在精神上始终跪在西方人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西方人，一味地崇洋媚外、虚心地接受被污蔑、被臭骂、被改造的可悲境遇，不自觉地戴上‘唯我独劣、封闭愚昧、迷信落后’的精神枷锁，养成了‘自轻、自贱、自虐’的洋奴精神。原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启蒙运动种下的祸根，是一些五四的精神领袖们惹下的祸。原来，他们率先丧失了中国文化和民族信心，率先精神大崩溃，盛情礼赞西方人，无情妖魔化中国人，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开启了‘全盘西化’的民族自强的发展战略，最终将中国人带上了崇洋媚外的疯狂列车”。<sup>37</sup>

以前学衡派也曾批评过新文学作家的崇洋媚外倾向，如梅光迪说：“吾国近年以来，崇拜欧化，智识精神上，已惟欧西之马首是瞻，甘处于被征服地位……国人又经丧权失地之余，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对于本国一切顿生轻忽厌恶之心，故诋毁吾国固有一切，乃最时髦举动，为弋名邀利之捷径。”<sup>38</sup>不过其落脚点只在指责新文学作家弋名邀利，而摩罗则将这种倾向命名为“逆向种族主义”，认为“它以对于西方种族的极度赞扬、对于西方文化的极度崇拜为一面，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极度鄙视、对于中国国民性格的极度批判为另一面”，“它把一种深刻的自卑心理永远种植在民族的神经元上，让中华民族成了一个失去理性思考能力、永远自轻自贱的可怜名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此套上了牢固的枷锁，所有的创造力、所有的信心、所有的智慧和尊严，都被牢牢地锁在其中”。<sup>39</sup>“逆向种族主义”这一命名，极其鲜明、极其尖锐，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按照摩罗的看法，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群，大都是逆向种族主义者，他们的作品不过是对中国国民性的妖魔化书写，摩罗对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精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精英在漫长的失败与绝望中，全面接受了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否定性评价，而且进一步将殖民者概括的国民性概念发展为国民劣根性，并进一步将殖民者为全民族打造的这道精神枷锁完整地转嫁到了底层群众的脖子上，自己则像孙悟空的元神一样，悄悄地从这枷锁中溜

---

51-52 页。

<sup>37</sup> 摩罗：《中国站起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150-151 页；2 页；27-28 页；51-52 页。

<sup>38</sup>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 2 期，1922 年 2 月。

<sup>39</sup> 摩罗：《中国站起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150-151 页；2 页；27-28 页；51-52 页。

走了。”<sup>40</sup> 摩罗对鲁迅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宣布要清除这种影响：“鲁迅如此折服于一个殖民主义者对于中国人的挑剔和批评，中国读者又如此折服于鲁迅的作品与思想，这条文化传播的纽带，染满了精神奴役的底色。无论这里开出多么美丽的文学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远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养料。”<sup>41</sup> 摩罗的这些观点，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建立起来的一些基本常识。鲁迅的方向曾被当作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按照摩罗的看法，鲁迅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影响，鲁迅的方向自然也就成了错误的方向。

秋风的贡献在于重新阐释了儒家文化，并批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理解。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如陈独秀批判三纲制度，认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sup>42</sup> 吴虞认为，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而儒家的孝弟二字又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sup>43</sup>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为新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反封建一直是新文学的重要主题。

而秋风在其著作《重新发现儒家》一书中，对所谓封建思想——儒家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该书共十八篇，大都采用驳论的写法。从各篇标题即可看出其维护儒家文化的立场。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真义”、“原三纲”、“礼教吃人乎？”、“宗族就是公民社会组织”、“原德治”、“名教导致虚伪吗？”、“儒家主张人治吗？”、“儒家主张集体主义吗？”、“儒家维护等级制吗？”、“谁在愚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真相”、“儒家是专制的帮凶吗？”、“性善论不利于民主吗？”、“重新审视民本与民主之关系”、“儒家反对变革吗？”、“义利之辨在辨什么？”、“儒家反市场吗？”、“儒

<sup>40</sup> 摩罗：《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275 页。

<sup>41</sup> 摩罗：《中国站起来》，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年版，150-151 页；2 页；27-28 页；51-52 页。

<sup>42</sup>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 卷 6 号，1916 年 2 月。

<sup>43</sup>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2 卷 6 号，1917 年 2 月。

家主张平均主义吗？”

其中，有两篇辩护对于现代文学研究来说相当重要。一篇是《礼教吃人乎？》，这一篇认为，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指控礼教吃人的证据，偏离了问题的焦点，搞错了事实的真相。如齐桓公之事，真相本是管仲以礼教化齐桓公，齐桓公听从管仲建议，从而维持了当时的礼治秩序，管仲去世后，齐桓公丧失了教化者，其欲望就放纵出来，就有了易牙蒸子进献之大恶。总之，秋风认为：“礼教并不吃人，没有礼教的治理架构才会吃人，没有礼之教化，人就会物化，丝毫不遮掩自己的欲望、力量，为了满足无尽的欲望而毫不留情地相互伤害，没有礼教，权力也会肆无忌惮。礼教也许确实不能让文人、青年们享有绝对的自由，但通过摧毁礼教追求绝对自由之结果，则是绝对的不自由。”<sup>44</sup> 秋风此篇只反驳了齐桓公这一个证据，但吴虞文中的另两个证据，即刘邦“分我一杯羹”的故事和张巡杀妾的故事，都不能证明“礼教吃人”。吴虞对礼教的指控，至少从证据上经不起推敲。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一直认为吴虞的“礼教吃人”深刻地阐释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主题。但在秋风看来，无论是鲁迅的意图还是吴虞的阐释，都是不成立的。另一篇是《原三纲》，这一篇重新解释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意思。秋风摘引了《白虎通义》中关于三纲的原文“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者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认为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之间的正确关系乃是刚柔相配，而非单向的支配—服从关系。秋风又引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篇》中“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一段话，指出：“君臣、父子、夫妇乃是相兼而又相合的关系。”<sup>45</sup>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一直将“三纲”理解为封建礼教之核心，认为这是束缚、剥夺人的自由的理念与制度，新文学也一直批判三纲制度。但秋风认为，新文化和新文学完全误解了三纲的本来意义。

以前林纾也曾批评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但林纾未能从学理上为“孔孟”和“伦常”进行有力的辩护。学衡派、章士钊等表示要尊敬中国传统文

<sup>44</sup> 秋风：《重新发现儒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43页；18页。

<sup>45</sup> 秋风：《重新发现儒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43页；18页。

化，但也未从学理上阐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19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的文化保守主义传人忙着批判激进主义，很少有人沉下心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而秋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细致的辩护。按照秋风的解释，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批判，有不少是建立在错误理解基础之上的。众所周知，新文学的整套知识体系建立在新文化基础之上，如果新文化的基础并不牢靠，那么，新文学的这套知识体系也就面临倾覆的危险。

概而言之，这一波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对新文学的批评，比以前的批评更为尖锐，更为彻底，只是因为现代文学学科在新的世纪里已被边缘化，这些批评才未能在社会上造成以前的那种轰动效应。

#### 四、三次浪潮的历史总结

百年以来，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新文学发起了三次较大的冲击，第一次浪潮在五四时期，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第三次浪潮则发生2004年至今。第一次浪潮，主要是反对新文学使用白话文；第二次浪潮，主要是批评新文学中的激进主义倾向。第三次浪潮，主要是批评新文学对中国国民性的贬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这三次冲击，对准的都是新文学的基础性问题。基础性问题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根本性的问题。基础性问题一旦动摇，往往就像地震一样，要震塌无数上层建筑。

文化保守主义的前两次浪潮，可以说没有找到新文学的真正缺点，未能对新文学造成真正致命的冲击。第一次浪潮针对白话文，但是白话文并不是新文学的缺点，相反，白话文学的创作实绩，使文化保守主义攻击白话文的理由宣告破产。第二次浪潮针对文化激进主义，但文化激进主义也说不上是新文学的致命缺点，学界主流至今仍然赞同文化激进主义的思路。第三次浪潮针对的是新文学对国民性的贬损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这些让人辩无可辩，可以说找准了新文学的“罩门”。因为新文学所建构起的一套知识体系都建立在国民性理论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之上，如果这些理论基础不成立，那么，新文学所建构起来的一套知识体系都将崩溃。

文化保守主义的前两次浪潮，总是站在历史大势的对立面，因为使用白话文是大势所趋，走激进革命道路也是大势所趋。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白话文，批判激进主义，扮演的是螳臂当车的角色，勇气虽可嘉，失败的结局却早已注定。但新



一轮文化保守主义浪潮，批判新文学的国民劣根性主题及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站在了历史大势的这一边而不是对立面。

在 21 世纪之前，因为中国整体落后，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时，中国人心中依然存在着强烈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又使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基因缺陷，中国人有国民劣根性，正如秋风所说：“怀疑传统、鄙视传统、仇恨传统、破坏传统，已经在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群中，变成了一种文化本能。在为数极多的人心目中，中国历史一片漆黑，儒家思想一无是处，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对于民主生活，甚至只有负面作用。凡此种种已经变成了常识。无数人、包括专家学者、官员、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假思索地接受这些常识，并把这样的常识当作真理，用以判断他所看到的一切学术、文化与社会现象。”<sup>46</sup> 基于文化自卑心理基础上的文化认知，本来就不具备多少科学性，但却成了新文学知识体系中不证自明的前提。

而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特别是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以前望尘莫及的世界列强，一个个被中国抛到身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在增强，文化自卑感在消散。历史大势已经发生变化，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说法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文化保守主义契合了新形势下中国人的心理，站在了历史大势的这一边。

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三次浪潮，既找准了新文学的罩门，又站在了历史大势的一边，因此，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将更为强烈，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评价将会改变，现代文学的一整套知识体系，将面临新的解构。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三次浪潮，也有片面及偏激的缺陷。并非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是摩罗所说的逆向种族主义者，即便是所谓逆向种族主义者，其思想也有复杂性。比如鲁迅的思想，就很难用逆向种族主义一言蔽之。而秋风对儒家文化所做的辩护也不一定都令人信服，儒家文化显然是存在缺陷和糟粕的，对儒家文化，我们不能无条件地认同和继承。总之，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三次浪潮，我们要注意到其洞见，在此基础上进行清理新文学知识体系的工作，但也要注意其偏见，不能无条件地认同文化保守主义的全部判断，在清理新文学的知识体系时要做到全面、客观，注意到新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新文学已成历史事实，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学的批判，已经动摇不了新文学

<sup>46</sup> 秋风：《当自由遭遇传统》，北京：语文出版社 2012 年版，2 页。

的合法性和生存权，但确实能增进我们对新文学缺陷的认识。在这里，我觉得，新文学研究界应当对文化保守主义抱持敬意。文化保守主义作为新文学的反对派而存在，不断挑剔新文学的毛病，这不仅对于新文学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都是有益的。

